

傅作義失足恨（一）

張 遐 民

——北平「和談」與綏遠淪陷真相

國軍乘勝攻克張垣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駐守張垣（張家口）日軍首長迭電傅作義，請速派員接收。奈當時限於兵力與運輸，一時無法到達察境。最後竟被共軍藉蘇俄支助而佔據了偽「蒙疆政府」所在地的張垣市。張家口是華北產煤鐵的中心，也是控制平津、直通外蒙，屏障綏、寧的軍路要地。日人盤踞八年，把察、綏、晉北及蒙旗的財富均集中於此，輕重工業大小工廠八十多家。因此佔領張家口，即可左右華北，共匪竊據不久，即將赤都由延安遷到張垣。馬歇爾之華北調處，制憲國大會之召開，均因匪黨在張垣得勢而受到了相當阻礙。傅作義奉命接收張垣，綏靖察綏，所以他對恢復張垣是無時釋懷的。歸綏包頭二市之圍解除後，共軍殘部退到綏東集寧、涼城、興和各縣，國軍略事整補，即向綏東挺進。集寧戰役，敵我雙方均付出重大代價，國軍窮追猛打，血刃肉搏，終將匪軍殲滅，收復了集寧。接着分兩路東

進，一路出涼城經晉北直抵張垣；一路出興和繞察北側入張垣。秋高馬壯，國軍進展至速，十月十一日，騎兵劉壽山部即攻入張垣。在市內的共匪，早將重要物資移走，他們並未料到國軍如此神速，故除以一支部主力在察東抗拒我李文部外，城內匪軍多數被俘，少數倉慌逃竄熱河。董其武率部進入張垣，大工廠與大建築物多被匪焚燬，餘煙未熄，慘不忍觀。表面上國軍收復了一個破爛的空城，但在精神上却得到重大的勝利，此後，軍調工作又繼續執行，華北局勢暫告穩定，這都是收復張垣的結果。

傅作義接掌華北剿總

張垣收復，中樞明令改組察哈爾與綏遠兩省省政府，任命原暫編第三軍軍長孫蘭峯（晚九）為察省府主席，原三十五軍軍長董其武為綏省府主席。張垣被偽蒙疆政府佔領八年，又遭共軍大肆洗劫，兵燹之後，滿目瘡痍。孫主席蘭峯就任之始，法令規章，一無所據，經費人員，籌措困難

。嗣經商定各廳處局主要職員以及一切規章法令，全由綏省府提供；如此，始逐步完成了建制，展開了各項行政工作，數月之間對建教各部門庶政，均能順利推動。

三十六年初，馬歇爾來華調處工作失敗，共黨在蘇俄積極支援下，公然反對國府各項措施，並在東北大量擴軍，企圖席捲東北，威脅華北，實現其赤化大陸的陰謀。此時在華北能與匪軍抗衡且不時予共軍重大打擊者，惟傅作義所部。中央為適應此一情勢，加強剿共陣營，防止林彪匪部竄入關內起見，遂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總轄晉、冀、熱、察、綏、平、津軍政事宜。當時傅作義正以全力從事察綏二省善後復員建設工作，傅曾由張垣電綏省府各委員，就接任剿總一事，徵詢衆意。各委員都認為：因部隊少裝備不足，黨政幹部人才不敷分配，平津地區環境複雜，建議以不接任為妥，以免將來失敗，不惟無補於大局，反影響察綏的政務，甚而牽動了西北全局，而自貽伊戚。最後中樞再三催傅就任，

傳不得已由察綏兩省黨政各機關中選調了一部份幹部，倉卒接掌華北剿匪總司令一職。

傳作義所部國軍主要編制爲：第三十五軍董其武，轄一〇一師郭景雲、新三一師安春山、新三二師李銘鼎；暫三軍孫蘭峯，轄暫一〇師王贊臣、暫一師王子修、暫一七師朱子純；騎四軍袁慶榮，轄騎新三師梁立柱、騎新四師王憲章；第六〇軍何文鼎，轄三六師（何兼）。迨收復張垣，察綏二省府改組，中央任命董其武爲綏遠省主席，孫蘭峯爲察哈爾省主席；董、孫既專管一省行政，原有之軍職勢難兼顧，傳遂報請中央任命郭景雲爲三十五軍軍長，安春山爲暫三軍軍長，袁慶榮爲暫四軍軍長。此三個軍前兩個軍每軍轄三個步兵師，後一個軍轄兩個騎兵師，各軍師連長以上之官佐，多爲傳、董、孫等久經訓練之基幹人員，士兵十之八九則由綏省民間徵調而來，此爲傳作義敢於接掌華北剿總一職最大的資本。

共 諜 報 密 作 戰 失 敗

傳作義接掌華北剿總後之作戰計劃，原擬以自統基幹部隊三個軍，先掃蕩察哈爾境內聶榮臻、楊成武之第二野戰軍，使平綏路暢通無阻，由察綏二省能自由進出平津，然後再會師河北平原，協同中央軍圍剿林彪統率的第四野戰軍決戰。故傳將三十五軍佈署在懷來、宣化之間，以新保安爲中心；暫三軍佈防於宣化、張垣之間，暫四軍留駐於張垣以西。

共軍方面，毛澤東「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

方針」十六條，其中第五條估計在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五天左右，林彪的第十、九、六、七、八各縱隊，集中在以玉田爲中心的地區。毛並向林提示，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期間，採取快速動作，以第三縱隊由北平東部東調，連同第六、七、八、九、十等六個縱隊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之間，隔斷國軍聯繫。第七條規定林彪在兩星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對張家口、新保安圍而不打；對北平、天津、通州隔而不圍，以待部署完成後，各個殲滅。又規定林彪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攻陷，以免迫使南口以南的國軍有所行動。

華北剿總在平成立，是以原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之人員爲基礎，剿總秘書長由原副長官部電務組負責人王明德接充。王爲傳之小同鄉，一直隨傳任職，曾任機要秘書。傳深信不疑，視爲最可靠之幹部，不幸竟是一名最陰險的共諜。傳之作戰計劃，除王某事先得悉外，再無第三人知道。王某將傳之作戰計劃全盤報告毛澤東，毛於是改變了原定作戰方針，命令林彪部直攻察省新保安國軍之主力。

平津戰役的地理形勢，在共軍方面，不能僅注意到津塘地區，而無視張家口、新保安和南口，因此等地區係傳部北進的後路。如果當時傳決策先北進河北，會合中央軍各部，也許可以打敗共匪二十萬華北野戰軍。林彪所部在東北重新裝備了日關東軍遺留之輕重武器後，於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洶湧入關，首先即注意傳部之動態。迨接獲共諜密報，即以兩個縱隊進迫南口，以

孤立新保安與張垣之間的國軍，並封鎖傳部北進的後門。林彪匪部出熱河、經沽源、獨石口、龍關而直迫懷來、宣化間之新保安。駐守新保安之三十五軍郭景雲軍長以及其所統率之三師主力，未與共軍正面作戰，即被林彪部的砲彈擊潰於新保安兩山間的深溝中，郭軍長遇難，全軍傷亡過半，林匪部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攻佔新保安。

暫三軍安春山聞三十五軍被困，即率部赴援，惜因天氣嚴寒，冰雪載道，交通阻塞，行軍途中，適遇林、聶等匪部分道進襲，一面作戰，一面後撤，率告敗潰。暫四軍袁慶榮知大勢已去，遂掩護敗退之友軍，撤至察北與綏東一帶。匪軍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攻陷張垣。傳部之精銳三個基軍，被共軍擊潰，損失慘重。

毛 首 誘 騙 局 部 和 談

共軍攻陷張垣後，會同由山海關入侵的另一部匪軍主力，直迫津塘地區，三十八年一月十四日攻佔天津，十九日攻佔塘沽。於是，北平四面被匪軍圍困，孤立無援，成了一座孤城。守北平的國軍除一部份中央軍外，傳之部屬僅有自察省潰散撤至北平郊區的三十五與暫三兩軍之殘部，戰鬥力大爲減弱。其時適有平津各大學部份教授學人進言傳作義必須走和平一途，以免文化區被燬於砲火；毛澤東更唆使邵寶珊、張治中、邵力子等靠攏變節份子，勸誘傳作義停止抵抗，和平共商國事。

北平「和談」，多由邵寶珊、周北峯二人促成。在所謂「八項協定」公布前，林彪曾以最後

通牒式的函件告訴傅作義：和、戰應速決定，否則以武力攻北平城。林彪函交鄧轉傳，但鄧未轉，迄協定簽字，北平各報將林函發表，傳見報問鄧，鄧答：如果讓你知道，和談便成功不了。傳於協定簽字後，曾召集幹部訓話：和談勢必爲之，今後我部隊不參加任何內戰，仍駐防北平近郊，一個人員也不更動。在政治工作方面，與共黨朋友們競賽，由過去的相互鬥爭，變爲現在的相互競爭，一定領導大家走向光明的大道。傳在協定簽字後，於二月廿三日赴石家莊，以個人名義通電全國，說明年來中樞和匪黨舉措之得失，伊個人不願再率領部隊爲少數人流血犧牲，決定從此罷兵言和（聞此電經共匪拍發時，將內容改變，加上許多詆毀中樞和領袖蔣公的辭句。）——傳遷往北平城內，僅有王克竣、趙仲容、于純齋伴從，其言行完全受匪方操縱。聞傳仍對人表示

，自信絕不至於把幹部引到錯誤的途上，運用新局勢已成功了十之七八。但和談不久，傳部駐平郊國軍，即有一部被調南下被迫參加對國軍作戰。共黨對傳部隊中之幹部極盡分化之能事，一面勸誘中級幹部進北平城內玩樂享受，一面煽惑士兵放下武器返鄉；因而士兵自動潛逃者甚多。華北「和談」告一段落，毛曾便進駐北平，一面誘迫李宗仁全面投降，一面進一步與傳商談解決西北未了的問題。毛曾未與傳晤談前，先囑高級共幹幾經研究傳的處境及其心理上的變化，結論認爲傳非投降不可。並故意製造新聞，說三十九年春夏之間，國際上將有重大的變化，美蘇發生衝突，美國將重新援助國民政府等，以觀察傳作義的反應。

毛曾與傳商談西北問題，目的在以和平手段解除傳部留綏的七萬武裝部隊以及甘、寧、青馬

家的子弟兵團。商談時的中間人是野心分子沾名釣譽的鄧寶珊。毛曾提出的條件：

(1) 在綏遠的傳部國軍不予改編，不參加作戰，仍留駐原防地，祇變爲共軍的番號。

(2) 綏省政府各縣市政府均不加以改組，原人原職，共方僅在各廳處局及縣市政府加派一人爲副首長，以便學習優良的政績

。(3) 綏遠省省銀行發行之鈔票與匪人民銀行票券共同在綏省流通使用。

(4) 預定傳爲甘寧青綏四省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俟偽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後，傳即坐鎮蘭州，統籌四省軍政要務。

以上四項條款，尤其是第四款，在對當時之傳來講，可以說極盡寬大而求之不得者，傅作義被共謀包圍，並受矇騙，信以爲真。他更沒想到：「毛曾對誰說過一句真話？」

焉返綏遠策動降共

傅作義於三十八年八月，離北平返綏遠，攜帶有綏遠省貿易公司儲存天津之大批青白土布。隨行人員有李世傑（伯屏）、于純齋、張濯清、王克竣、閻又文等十數人，監視人爲鄧寶珊，傳離北平行前拜別毛曾澤東，毛送出寓所含笑對傳說：「宜生，我昨晚聽一人告訴我，宜生此去再不返回北平了，是嗎？」當時，鄧寶珊即插口說：「主席，你放心，宜生之爲人我最了解，向來是說一不二，言行一致。此去，宜生如不返平，我可以將頭交給主席。」

傅作義離綏遠日久，傳軍各師團之幹部多直接受董其武、孫蘭峯、安春山、袁慶榮等各軍事長官之節制。傳等一行，乘平綏路專車抵綏後，鄧寶珊住歸綏市，傳駐歸薩間之麥達召，觀察情勢，此時綏遠省垣治安已呈不穩，省府重心已移至包頭市。某夜曾有人向鄧寶珊寓所投擲手榴彈，以示警告。董其武爲鄧安全計，接護至包市，

一失足成千古恨

抗日戰爭時期深受國人敬重的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後，誤蹈共匪局部和談陷阱，陷共後失去自由抑鬱而沒。



傅亦遷寓市之南門外皮革廠，作為辦公處所。傳返綏期間，適中樞應董其武請求，迭派飛機運械彈與餉銀，接濟在綏部隊，傳又由天津帶同大宗縫製軍服的布匹；故傳自返綏後，即不斷親至各團連講話，分析時局，為共僑毛澤東作說客，勸告官佐士兵，祇要跟着他走，就能達到預期之目標。一般官佐士兵，始而不樂於聽傳講話，既而領到了銀元和服裝，大家便說：還是總司令有辦法，他回來了，中央政府給我們送銀元，毛共也給我們送衣服，聽總司令的話沒有錯。如此，傳又取得官兵們之信任，而對其實行投共或抗共，都增加了很大的信心。（註一）

徐永昌飛包頭說傳

傅作義自北平返綏遠，中央早已得到情報；但傅作義返綏遠究將為何，中央不悉其情，傳留駐包市期間，曾數次到機場迎接中央代表，但都落空。傳認為中央已對他失望，故積極準備走降共一途。中央接情報人員電催速派員到包頭說傳，再遲則局勢難以挽回。於是三十八年八月七日，中央派徐部長永昌率同隨員王鴻韶、徐汝誠、方克猷、鄧和及我等數人，乘專機飛重慶，轉飛包頭（註二）。不意飛抵重慶後，因華北一帶連日大雨，漢中、蘭州兩地機場關閉，中途無法降落，於是滯留渝市不克北上。嗣後總裁蔣公在渝接到駐綏人員之情報，謂「如再不派大員來渝，變局即難以扭轉」，總裁遂指派馮驥坐機之衣復不行；徐稟陳其故，總裁遂指派馮驥坐機之衣復恩上校親駕軍機送徐部長我們北上。十六日午後

二時起飛，中途未降落，四時三十分飛抵寧夏銀川市，機場中一片泥濘。留宿銀川市。馬代主席敦敬與馬子寅先生曾告訴徐部長：最好不必去包頭，去也挽回不了變局。徐部長決定：不管怎樣，見傳作義後再說。此時，部份共軍已竄至寧夏境內之中衛，二馬（馬敦敬馬子寅）表情，惶惶不安。翌晨七時許，自寧夏起飛，機上多添了一位馬子寅先生，十一時許降落包頭市小型軍用機場。我等下機，傳作義與鄧寶珊已站在機場笑臉相迎，傳說：「昨晚接子寅兄電話，我不相信，因為我來機場已兩三次了，皆未接到來員，今日為最後一次，不料次宸徐兄你真來了。」機場內除傳、鄧數人外，顯得十分冷落。我們正要乘車離機場，傳說：「次宸稍等一下，因為我不相信你們來，故未準備護軍政地方人員來機場相迎，現已告知他們馬上即來，請稍待。」不久，果有大批人員由董其武主席率領湧入機場，經傳介紹後，相偕進入包市。

徐部長永昌由傳陪同直接到包市南門外之皮革廠，傳之辦公處（該處係日人設置頗具規模為進犯西北軍用的皮革廠），初次商談大局。我係綏遠省人，且服務地方黨政教經各單位十餘年，無論在政在軍各界，熟人甚多，大家處在局勢沈悶，匪患猖獗的情勢下，都想知道外邊情況的發展及如何保家衛國自處之道。因而，由董送我至省銀行包市分行共進午餐後，即不斷有友好來訪，探詢一切。其實我所知有限，而李代總統屬我轉告傳作義的話亦不便公開，對着衆多的同鄉同事好友，真令我不知從何說起。午後我先拜訪隨傳返

綏的重要人員李參謀長伯屏以及張高參濯清、王克竣、于純齋、閻又文等。李對我說：「剛才聽美國廣播，參議員康納利發表談話，聲言不再援助國民政府，……今後對匪作戰將更困難了」，我問傳返綏究如何？王克竣答：「大家來決定」。並告訴我：「共黨在平情形：北平戶口至今未弄清楚，組織控制嚴密，多數人實幹」。繼又訪省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于存灝及監察委員陳志仁等，大家都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異口同聲說：「只有聽傳總司令的決定了」。第二日晨，由傳總司令辦公處轉來電話：「總司令約張廳長（我當時係綏省財政廳長）於十時半到皮革廠談話。」我知時間尚早，與地方數位青年在茶館早餐後，即訪孫蘭室司令官。孫蘭室性直爽，一見面即說：「退民兄，你回來的正好，如果你們這次說不服總司令，俺瞧，綏省及西北大局是無救了。我告訴退民兄，你要提醒總司令，不要再上當了。我們大家商議數天，無法挽回。我住病院，即表示不願簽字附匪……。」正交談間，辦公處又來電話轉知我「總司令因與徐部長等開會，前約談時間改在午後。」中午十二時，傳在皮革廠正式設席邀宴徐永昌、馬子寅及我等。席散，傳送馬等下樓時，即回首告我：「退民，你留此，我送客回來，在此好好談談。」（未院）

購買中外雜誌叢書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帳戶或電七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